

抗战胜利后第三战区在浙江的“洽降”与“受降”¹

张学继

【提要】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战区及所属16个（分）战区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过程无一例外地经历了接洽投降（简称“洽降”）与正式受降（简称“受降”）两个阶段，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抗日战争胜利过去70余年了，至今尚无学者对第三战区在浙江的洽降与受降的过程进行专门的研究，其结果仍然是洽降与受降不分，混为一谈，造成基本史实不清的状况。作者根据第一手历史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富阳洽降、杭州受降的结论。

【关键词】 第三战区 富阳洽降 杭州受降 顾祝同 野地嘉平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战区及所属16个（分）战区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过程无一例外地经历了接洽投降（简称“洽降”）与正式受降（简称“受降”）两个阶段，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惯例。^②遗憾的是，抗日战争胜利过去70余年了，至今尚无学者对第三战区在浙江的洽降与受降的过程进行专门的研究，其结果仍然是洽降与受降不分，混为一谈，造成诸多的史实错误。有鉴于此，笔者根据有关史料拟对抗战胜利后第三战区在浙江富阳洽降与杭州受降的史实进行辨析，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有不当之处，欢迎专家学者及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一、将富阳洽降与杭州受降混为一谈是目前学术界最普遍的现象

对于第三战区在浙江地区的受降过程，目前几乎所有的著作及论文几乎都是“洽降”与“受降”不分，混为一谈。笔者下面举几个例子：一是《浙江通史·民国卷》下册，该书第七章第四节第四小目的标题就是“驻浙日军宋殿投降”，该书写道：“属第三战区的浙江省为第六受降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受降主官。在顾祝同的推荐下，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主持浙江的受降事宜。……浙江的受降点为富阳县的宋殿村，日军第一三三师团长野地嘉平为日本的投降代表。1945年9月4日，主持受降事宜的韩德勤进驻宋殿村。当天下午在该村约见了日军投降代表野地嘉平，向其传达了有关受降的指示。9月6日上午，中国受降代表在富阳宋殿村正式举行了仪式。受降台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席台，上设圆桌为中国受降席，台下设日方投降席。参加受降仪式的中方代表有韩德勤、副参谋长兼前进指挥所参谋长张世熙、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罗霞天等。上午11时许，野地嘉平等一批日军军官乘坐汽车从杭州到宋殿，他们先在受降台附近听候中方指令，随他们一起来的日军卡车上的日军士兵则相继下车将武器架在地上，由中方收缴。受降仪式开始后，日军投降代表先至投降席向中国受降代表鞠躬致礼，接着按照约定的程序由日军第一三三师团参谋长今井呈缴投降代表身份证明文件、官兵名册、武器清册等，然后由野地嘉平代表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最后呈给中国受降代表韩德勤，受降仪式至此完毕。”^①

¹作者张学继，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浙江省历史文化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杭州 310007

² ①参见戚厚杰、卢彦名：《中国战区受降地究竟在何处——芷江洽降与南京受降之辨析》，《日本侵华史研究》2014年第4卷。

二是《杭州历史大事记》，该书在 1945 年 9 月 4 日这一天写道：“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及上官云相、浙江省党政要员在富阳县长新乡举行浙江等地日军投降仪式，日军一三三师参谋长樋泽一治大佐代表日方签具投降书。……长新乡后改称受降乡。”^②该书在一张历史图片上还特别注明：“富阳宋殿受降仪式旧址。”^③

三是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的《浙江历史大事记》称：“（1945 年 9 月）4 日，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副长官韩德勤和参谋长张世希在富阳宋殿（今受降镇）接受在浙江省等地日军投降，驻杭日军第一三三师团长之代表、师参谋长日军一三三师参谋长樋泽一治大佐向中方呈交了投降日军的兵力、驻地、指挥系统、官长姓名等图表。”“（1945 年 9 月）6 日，侵浙日军投降仪式在富阳宋殿村举行，韩德勤代表中国政府主持接受日军投降仪式；侵杭日军最高指挥官、第一三三师团长野地嘉平代表日方在投降书上签字。”^④

四是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一卷）（1921-1949），该书对浙江洽降、受降过程有如下一段叙述：“9 月 4 日，侵浙日军投降接洽仪式在富阳城北 8 公里处的宋殿村举行，中方受降主官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日本投降代表为第一三三师团长野地嘉平。他在投降书上签字后，恭恭敬敬地呈送给中国代表。此时，方圆几十里赶来的农民，看到此情此景，都极为振奋和激动，有的竟泪流满面。后来，为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这一历史性事件，富阳宋殿村所在的长新乡改称为‘受降乡’。”^⑤

五是浙江省政协主办的《联谊报》的相关报道与文章。该报 2015 年 9 月 3 日出版的“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特刊”，其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富阳宋殿见证日军投降》，文章称：“在富阳城北八公里紧靠杭富公路的宋殿村，是浙江地区日军向我国签署投降书的地方。为了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富阳人民就把宋殿村改称为受降村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浙江地区的日军由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负责接受投降事宜，并确定富阳的宋殿村为接受日军投降的地点。顾祝同派副长官韩德勤先期率部进驻富阳宋殿村，主持受降事宜。驻杭州日军第一三三师团长舒地嘉先派一个大佐至宋殿洽降。受降仪式于 1945 年 9 月 4 日举行。是日，舒地嘉从杭州赶到宋殿村，代表日本军方在投降书上签字，韩德勤代表中国政府主持受降仪式。……”^⑥当天的《联谊报》同时还发表过一则消息：《省政协之友社社友参观抗战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该消息称：“据史料记载，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战区划分为 16 个受降区，浙江为其中之一。中国军队接受在浙侵华日军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富阳受降举行。”^⑦

上面所引用的有关浙江历史的五种权威著作与出版物全部将洽降与受降混为一谈，有关时间、地点、人物姓名、身份等的说法五花八门，相互矛盾。有的为了自圆其说，甚至不惜编造史实，这是很不足取的。

二、在富阳宋殿村举行的只是第三战区的洽降仪式

³ ①《浙江通史·民国卷》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18-319 页。

②③《杭州历史大事记》，方志出版社，2006 年，第 507 页。

④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浙江历史大事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722 页。

⑤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427 页。

⑥《联谊报》，2015 年 9 月 3 日（总第 3216.3217 期合刊），第 8 版。

⑦《联谊报》，2015 年 9 月 12 日（总第 3220 期），第 1 版。

鉴于目前学术界对第三战区接受日军投降的过程的叙述存在种种的问题,笔者查阅了相关的第一手及历史资料,为揭开这个谜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通过驻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公使转达反法西斯同盟国美、英、苏、中四国。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盟国答复日方: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必须听从盟军最高统帅之命令;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表示之意愿确定之;同盟国之武装部队将留于日本,直到达到《波茨坦公告》所规定之目的为止等。^①14日,日本天皇裕仁主持御前会议,决定接受同盟国的答复。会后起草了《天皇宣告投降敕书》。15日,《天皇宣告投降敕书》通过电台向日本国民公开播送,宣告日本向同盟国投降。16日,日本战时大本营根据盟军统帅部命令通令所有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停止作战,向盟军无条件投降。^②8月1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宣布日本政府正式无条件投降公告。当天,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致电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该指挥官应立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江西)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四、所有飞机及舰船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五、不得破坏任何设施及物资。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及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③

16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及各行营(辕)主任、各战区司令长官等,宣布:“查日本政府已于本月寒日接受同盟国所提促降条件,兹特派何(应钦)总司令全权处理受降事宜,未接何总司令整个措置与指示以前,不得局部各别收缴日军武器,以免纷歧冲突。”^④18日,蒋介石又致电何应钦,规定了何应钦的12项任务。^⑤

日本向盟国签字投降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向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国投降。9月2日,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由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代表盟国接受日本投降,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和日本大本营代表梅津美治郎分别在投降书上签字,出席这个仪式的中国政府代表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二级陆军上将徐永昌。9月9日,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投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代表何应钦(参谋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南行辕主任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二级上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陆军中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海军一级上将)、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空军上校)在受降席就坐。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陆军大将)在投降书上签字,向中国投降。

1945年9月1日,日本大本营根据盟军统帅部命令通令驻扎国内外的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停止作战,向盟军无条件投降。中国方面(东三省除外)及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之日军向中国战区蒋委员长投降;东三省及朝鲜(北纬38度以北)及南库页岛方面之日军向苏联红军投降;安达曼、尼科巴、缅甸、越南(北纬16度以南)、马来亚、婆罗洲、荷属东印度、新几内亚俾士麦及所罗门岛方面之日军,向英国蒙巴顿元帅或澳洲司令投降;日本本土及朝鲜(北纬38度以南)及菲岛之日军,向美国太平洋方面陆军总司令投降。^⑥根据蒋介石8月18日及何应钦8月25日的命令,中国战区分为以下16个分受降区:(1)北越地区,即越南北纬38度以北地区,受降主官为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陆军中将卢汉。(2)广州地区,受降主官为中国陆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3)汕头地区,受降主官为中国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4)长(沙)衡(阳)地区,受降

⁴ ①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319页。

② 台北“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9月),第723页。

③④⑤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9月初版,第613、613-614、615-617页。

主官为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5)江西地区,受降主官为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6)浙江地区,受降主官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南行辕主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7)沪宁地区,受降主官为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8)湖北地区,受降主官为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9)徐蚌地区,受降主官为中国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10)平津地区,受降主官为中国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11)山西地区,受降主官为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12)洛阳地区,受降主官为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13)®城襄樊地区,受降主官为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14)山东地区,受降主官为中国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15)热河察哈尔绥远地区,受降主官为中国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16)台湾地区,受降主官为中国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仪。^②

中国战区以及16个分战区的受降程序无一例外都有洽降与正式受降两个阶段。有学者指出:“在受降之前举行洽降,既是战争结束时必要程序,也是国际通例。”“洽降作为受降的一个先行过程,必须进行。……因为战争是由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进行的,在战争的进程中,双方对兵力部署、通讯联络及作战意图都极端地保密,一旦一方宣布战败投降,就是战争的终止,投降的一方就要向对方解密,就要派员进行沟通,建立联络,否则会产生误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古今中外,尽管洽降的方式、内容不同,但都经历了洽降这一过程。”^③

中国战区洽降地点原本定在江西玉山^④,因玉山机场被毁坏不能起降飞机,蒋介石临时决定将洽降地点改为湖南芷江。8月17日,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改为芷江机场。”^⑤8月21日,日本“驻华派遣军”参谋长今井武夫作为乞降使者与其随行人员共8人飞抵芷江,由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召见,萧毅肃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交给今井武夫,该备忘录指示日军投降应行准备之事项。今井武夫则将随身带来的日军在华兵力配备地图面呈萧毅肃,这就是芷江洽降。而侵华日军正式投降仪式则于9月9日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的,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代表何应钦接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

除中国战区外,其它16个(分)战区也经历了“洽降”与“受降”两个阶段。例如,平津地区受降主官为中国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孙连仲接受命令后,任命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吕文贞为第十一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率领部分成员先行进驻北平,与日军“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委派的全权代表、“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高桥“接洽投降事宜”。^⑥10月10日,平津地区受降仪式在北平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由中方受降主官、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接受日军“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的投降。^{⑦⑤}

浙江属于第三战区。第三战区原本包括浙江省、福建省、上海市的全部以及江苏省南部、安徽省南部、江西省东部,地域很广。蒋介石鉴于三战区兵力有限,决定缩小第三战区的受降地域,于8月18日电令军事委员会东南行辕主任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定顾氏为第三战区受降官,指挥第三战区部队负责接收浙江的嘉兴、金华、杭州、宁波与福建厦门地区。^⑧日军在福建的军队不多,只有部分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厦门地区,后由第三战区委托海军部代为接收。驻上海松江的日军第六十二独

^⑤ ①台北“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9月),第723页。

②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战区受降纪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4—145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第613—624页。

③ 戚厚杰、卢彦名:《中国战区受降地究竟在何处?——芷江洽降与南京受降之辨析》,《日本侵华史研究》2014年第4卷。

④⑤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第614—615、615、674页。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139—141页。

立混成旅团亦改由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负责接收。^②所以，第三战区受降实际上仅限于浙江。顾祝同受命后，电令浙江境内的日军逐次向宁波、杭州集结，以便解除其武装遣送回日本。8月20日，制定了《第三战区接受日军投降计划》，决定成立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前进指挥所，由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率领第三战区参谋长张世熙及部分参谋人员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江西省铅山县先行开往浙江杭州地区，与驻扎杭州的日军接洽受降事宜。^③8月30日，顾祝同通过伪国民政府杭州绥靖公署主任兼伪浙江省政府主席丁默村向驻杭州的日军第一三三师团长野地嘉平中将发出第一号、第二号备忘录，令他派代表携带日军在中国嘉兴、杭州、金华、宁波（包括舟山群岛）、厦门各附近地区的日军各部队兵力、驻地指挥系统、长官姓名等图表于9月4日18时至富阳与第三战区前进指挥所韩德勤主任接洽投降事宜。^④

9月4日下午4时30分，在富阳长新乡宋殿村举行第三战区的洽降仪式，驻杭州的日军第一三三师团参谋长樋泽一治大佐作为师团长野地嘉平的代表向我第三战区参谋长张世熙接洽投降事宜。在樋泽一治呈缴驻浙日军官兵名册、武器清册等文件后，张世熙当即指示两点：驻杭州日军全部集中里西湖一带，日本侨民集中旗下一带。5日上午10时，韩德勤召见樋泽一治，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致野地嘉平的第三号、第四号备忘录交泽一治转交，韩德勤并口谕：本指挥所为便利处理受降起见，本日启程进驻杭州，希望日军配合。^⑤

由上面的叙述可知，在富阳长新乡宋殿村举行的只是一个洽降仪式，并非受降仪式。中方出面接洽的主官是第三战区参谋长张世熙，并非是某些著作一再提到的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日军方面出面接洽投降的主官是日军第一三三师团参谋长樋泽一治大佐，而不是某些著作一再强调的所谓野地嘉平或者说舒地嘉。野地嘉平（或舒地嘉）根本没有去富阳。

有趣的是，《富阳宋殿见证日军投降》一文的作者为了坐实宋殿“受降”，在文章中大谈特谈所谓舒地嘉从杭州赶到宋殿并在宋殿签字投降的种种细节。可是，他没有想到，该报责任编辑无意中配发的一张照片却明白无误地显示，日军“投降席”（严格说来应该是“洽降席”——笔者注）上带头的乃是泽一治大佐，而非所谓舒地嘉，这就造成了文章与照片自相矛盾的局面，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二、第三战区受降地点在杭州但形式比较特殊

9月5日下午，韩德勤率领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前进指挥所进驻杭州城内新民路原中央银行杭州分行大楼，着手处理日军投降事宜。^⑥

9月13日，第三战区受降主官顾祝同在参加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后，从南京飞抵杭州。韩德勤率领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前进指挥所于即日宣布撤销，另在杭州城内原基督教青年会旧址设立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⑦当天下午，顾祝同在司令长官部接见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南京受降典礼后，中国战区内各地不再举行仪式，仅以命令传给当地日军最高长官，令其遵照办理，杭州亦同。”

第三战区受降主官顾祝同进驻杭州后，日军投降主官改为“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久太郎中将。因为松井久太郎

^② ①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第618页。

②③④⑦顾祝同：《墨三九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编印，第231、225、228-229、229-230页。

⑤《东南日报》1945年9月6日。

⑥《东南日报》1945年9月7日。

的司令部在上海，松井久太郎委托野地嘉平作为他的代表与顾祝同接洽投降事宜。

9月15日上午，顾祝同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召见日军投降主官松井久太郎的代表野地嘉平中将（日军第一三三师团长）、长岭喜一少将（日军第六十二独立混成旅团长）及通泽一治大佐（日军第一三三师团参谋长）等3人，顾祝同将“杭字命令”“第一号、第二号”交给野地嘉平，令其转达松井久太郎（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遵照执行。

9月18日，驻杭州地区的日军完成缴械。2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抵达杭州视察受降情况，并于21日在杭州召见野地嘉平，指示办理未完手续。从10月9日下午开始，已经解除武装、集中于里西湖的日军开始向嘉善集中营转送，至13日转送完毕。

第三战区杭州受降与其他地区受降不同的是，其它各地区均举行了公开的有各界人士和新闻记者等参加的规模很大的受降仪式，受降仪式的地点分别在南京、河内（越南）、南昌、长沙、广州、汕头、汉口、深河、郑州、蚌埠、济南、北平、归绥、台北等，都是各（分）战区内的中大城市。而第三战区则是唯一没有公开举行大规模受降仪式的地区。

笔者以为，第三战区之所以没有公开举行大规模的受降仪式，可能有两点原因：第一、中日双方军事主官地位悬殊。中国第三战区受降主官是陆军二级上将，而日军的投降主官代表仅是一个陆军中将，接受一个中将的投降不会给顾祝同带来多少荣耀。第二、更重要的可能与第三战区受降主官顾祝同作为中国战区陆军代表出席了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有关。^⑦在顾祝同看来，他已经作为二号人物参加了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在第三战区就没有必要再重复搞一个受降仪式了。

不过要说明的是，顾祝同说“南京受降典礼后，中国战区内地不再举行仪式”的话并没有得到贯彻，其他战区还是举行了正式的受降仪式。毕竟，这个仪式来之不易，谁也不会轻易放弃。

三、两个史实辨误

第一、关于韩德勤的职务问题。

《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说：“中方受降主官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1）如前所述，第三战区的受降主官是顾祝同，而不是韩德勤。（2）韩德勤此时早已不兼江苏省政府主席。查《国民政府公报》及《民国职官年表》可知，韩德勤已于1945年1月1日免去江苏省政府主席一职，由王懋功接替。（3）如前所述，在1945年9月浙江受降前后，韩德勤的职务应该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

第二、关于富阳县长新乡改名“受降乡”的问题。

富阳县宋殿村所在的长新乡在日军投降后改称为“受降乡”（后来又称受降镇），这是历史事实。但正如上面所述，在富阳县宋殿村举行的只是一个洽降仪式，并非正式的投降仪式。严格说来，长新乡只是“洽降乡”，而非“受降乡”。但中国历史上这种以讹传讹的例子并不少见，将错就错称呼他为“受降乡”也未尝不可。只是做历史研究时还得讲究实事求是，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因为有了这个“受降乡”的地名，就一定要反过来肯定富阳“受降”的历史事实。

⁷ ⑦顾祝同：《墨三九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编印，第229—230页。